

蔡智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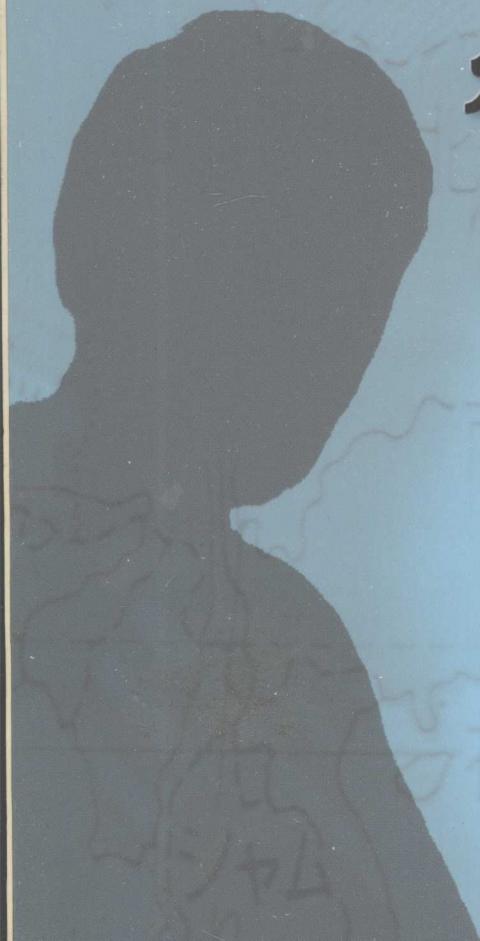
與

田

劉建業 / 高殿芳 主編

中 奏摺

欲 必 征 必 征
 先 服 先 服
 征 支 征 世
 服 那 服 界
 滿 支 那
 蒙 那



蔡智堪與田中奏摺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高殿芳
劉建業

主編

蔡智堪與田中奏摺

編者 高殿芳 劉建業

發行人 黃溪南

主編 洪宜勇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地址 局版台業字第五九六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理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四〇巷三號一樓

電話：(〇二) 二二六八二五二五 傳真：(〇二) 二二六九八二二二

港澳總經理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三號華耀工業中心一四樓一〇室

電話 (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九八

傳真 (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排版所 宜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六六一七四五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三六四三

定價 二〇〇三年四月

初版 三五〇元(平裝)

撥帳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號 價 ISBN 957-2040-48-0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785.00

出版說明

本書原本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所編的《田中奏摺探隱集》，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發行。

台灣版加上程玉鳳女士的兩篇文章，作為「附錄」。程玉鳳著有《台灣志士蔡智堪傳》，為研究蔡智堪先生與《田中奏摺》的權威學者。

《田中奏摺》自從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在南京的《時事月報》發表之後，至今七十多年來，史學界一直鬧得沸沸揚揚，言人人殊，各執一詞。

《蔡智堪與田中奏摺》一書，收錄了正、反雙方學者的各種論述，真偽是非，則由讀者諸君自行研判了。

海峽學術出版社編輯部二〇〇三、三、十三

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許多謎一樣的事件，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卻一直縈繞於人們心懷。在這些歷史之謎中，有一個曾經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轟動的《田中奏摺》之謎，更是若明若暗、撲朔迷離，使許多歷史學家為之注目，也令許多軍事家、政治家被其眾說紛紜的說法搞得莫衷一是。

所謂《田中奏摺》，是指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期間出任日本首相的軍國主義者田中義一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呈送天皇的一份題為《對滿蒙的積極政策》的文件。這份文件，全面闡述了田中內閣對中國侵略的步驟和計畫。

據說，《田中奏摺》是田中義一通過宮內大臣一木喜德交給昭和天皇的。但這份秘密文件自一九二九年被中國公布後，由於它牽涉到了日本的整個大陸政策，所以日本政府堅決否認它的存在，但中國以及其他一些二戰參戰國則不斷引用《田中奏摺》中的內容來揭露和抨擊日本的侵略擴張政策。從那時起，關於《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一直成為學術界爭論不

休的熱門話題。半個世紀以來，爭論迭起高潮，但始終沒有得到過統一的認識。最近幾年，國內外學者又一次掀起探討《田中奏摺》是否存在的熱潮。

《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也引起了社會上的重視。由於這份「奏摺」與一些傳奇人物相聯繫，又涉及了一些充滿傳奇色彩的傳說，因而就更容易引起人們的重視。為把五十餘年來圍繞《田中奏摺》進行的爭論介紹給廣大讀者，也為了促進對《田中奏摺》的進一步探討、研究，我們把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論文和文章整理出來，彙成這本《田中奏摺探隱》。它即可以做為研究人員的資料，也可以做為對廣大讀者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參考讀物。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加之能夠掌握的資料也不齊全，所以此書難免有掛一漏萬的缺陷。需要說明的是，為保持歷史原貌，在此書中，除了將繁體字改為簡體字。對當時發表的《田中奏摺》等文章未作任何文字改動及計量單位的換算。如果這本文集能夠對普及及近現代史的學習起到一點提供資料的作用，我們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編者

一九九二年八月於盧溝橋畔

目錄

出版說明 / 一

前言 / 三

《田中奏摺》探隱 / 劉建業 / 001

《田中奏摺》(中文譯文並原序) / 015

我怎樣取得《田中奏章》 / (台) 蔡智堪 / 057

《田中奏摺》與蔡智堪 / (台) 趙尺子 / 065

蔡智堪與《田中奏摺》 / 林其泉 / 079

日本兩機密文件中譯本的來歷 / 王家楨 / 083

王家楨與《田中奏摺》 / 高殿芳 / 089

關於《田中奏摺》的來龍去脈 / 高殿芳 / 101

- 弔愛國老人蔡智堪先生／（台）余甦賢／119
- 日本田中首相兼外相訓令（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125
- 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與蔣介石的會談紀錄（節錄）／129
- 《田中奏摺》的有關問題／（日）橋川文三／131
- 《田中奏摺》果真是偽造的嗎？／（日）江口圭一／147
- 《田中奏摺》的真偽／（日）江口圭一／161
- 《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章伯鋒／171
- 日本東方會議和田中義一內閣對華政策——評《田中奏摺》／沈子／181
- 日本的大陸政策與《田中奏摺》／趙連泰／209
- 日本對外擴張的綱領——《田中奏摺》／甄客 師堪／219
- 田中義一及其對華侵略的「積極政策」／趙連泰／225
- 《田中密奏》考證／培棧／241
- 日本出兵山東與東方會議／林明德／251
- 東方會議真相與《田中奏摺》問題／俞辛焯／267

《田中奏摺》並非偽作 / 高殿芳 / 289

關於《田中奏摺》真偽的幾個問題 / 穆耳 / 299

對蔡智堪取得《田中奏章》的質疑 / 鄒有恆 / 315

「田中外交」的對華政策 / 沈予 謝雪橋 / 331

「東方會議」與《田中奏摺》 / 陳本善 / 355

《田中奏摺》真偽辨析 / 郭彬蔚 / 365

附錄

台灣愛國奇人蔡智堪——再論《田中奏摺》的真偽 / 程玉鳳 / 379

歷史事實是從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 / 沈予 程玉鳳 / 389

《田中奏摺》探隱

劉建業

一九二七年四月，日本軍國主義代表人物田中義一出任首相。六月底，由田中主持召開了以研究積極侵華政策為主題的「東方會議」。後不久，就傳出了田中有一個直接呈送給天皇的秘密奏摺《對滿蒙的積極政策》。由於這個奏摺聯繫著日本的整個大陸政策，因而引起美、英、俄等各國的極大關注，派出大批力量獵取其內容，但一無所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國南京出版的刊物《時事月報》，公開披露了《田中奏摺》的主要內容，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強烈反響，日本政府之震動，極力否定這個奏摺的存在。從此，《田中奏摺》的有無問題就成為國際間史學、軍事學、經濟學專家們爭論的一個熱門話題。

五十多年過去，《田中奏摺》仍像一個謎，撲朔迷離，捉摸不定，儘管日本政府及當時日本政界、外交界的頭面人物，已經上百次否定《田中奏摺》的存在，但直到現在仍然有人不得不一百零一次，一百零二次地站出來為證明這個奏摺的存在而大聲疾呼。本世紀六〇年代，日本學術界曾對《田中奏摺》的真偽展開過激烈辯論。一九六五年日本出版的《中國》雜誌，利用兩期的篇幅，專門發表一些日本學者的文章，基本上得出了《田中奏摺》係贗品

的結論，使這一段公案在日本暫時有了個了結。但是，在國際間，尤其是在中國，並沒有因為日本否定這個奏摺，就停止了對它的追查和研究。隨著二戰史研究的深入發展，國內外（包括日本）都有人重新提出了《田中奏摺》不是偽品，最近幾年，中國大陸及台灣、香港、美國等學術界有不少學者指出，《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它牽涉到對日本整個擴張主義政策的探源問題。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不但對日本在二戰中的整個活動能有一個合乎邏輯，符合事實的評價，同時也對正確總結第二次大戰史有著極大的影響。因為如果《田中奏摺》是真，那麼至少可以斷定，日本的侵華戰爭以及嗣後的一系列侵略擴張活動，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最遲在一九二七年田中內閣期間，就已形成了一張系統的有周密計畫和嚴格步驟的侵略擴張藍圖。這張完整的侵略藍圖，不但使全世界近五十個國家蒙受了戰爭的苦難，也同時注定了日本帝國的覆亡。如果《田中奏摺》是偽造的，那麼對日本在二戰中的每一個行動，則要做具體的分析，包括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從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到發動太平洋戰爭，這一系列侵略擴張行動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總體規劃下進行的，就應做另一種分析了。

正因為《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關係著當時世界形勢的總格局，所以在二〇年代末期，當它剛剛被傳出時，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動。首先是前蘇聯立即聞風而動，一方面希望儘快摸清《田中奏摺》的底細；一方面又在軍事上、外交上採取一系列應付的措施，以期延緩日本對蒙古和蘇聯西伯利亞的進攻。顯然，斯大林是相信《田中奏摺》的真實性的。美國也清楚地意識到，如果《田中奏摺》確實存在的話，日本的作戰目標就絕不僅是一個中國，美國

也遲早被日本列為攻擊和征服的對象。但是由於當時的日本政府動用了一切宣傳手段，極力否定《田中奏摺》的存在，所以美國對這個奏摺採取了存疑的態度。雖然他們曾派出力量調查《田中奏摺》，但並沒有給予高度的警惕，直到日本吞併了滿蒙，侵占了大半個中國，隨即偷襲珍珠港，占領了香港、新加坡、馬來亞，把戰火燃遍整個太平洋，美國才感到《田中奏摺》似乎不是偽造的。二戰結束後，中國曾準備在國際軍事法庭上把《田中奏摺》做為一個罪證，但美國認為一旦把這個問題拿到法庭上來，就會形成對日本天皇的威脅，因而以「真偽難辯」為由，阻止了對《田中奏摺》的追究；從這裡也可看出在美國政府心目中，《田中奏摺》確係一個舉足輕重的文件。而日本當局在奏摺被披露前後，則採取大量措施，極力壓制對奏摺的宣傳，並通過各種途徑，動用各種手段矢口否認《田中奏摺》的真實性，從中也可看出《田中奏摺》消息傳出後對日本當局的極大震動。

正因為《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關係著對整個二戰史的研究和評價，所以二戰結束後，許多政治家、外交家、戰略家、歷史學家們才始終對其「糾纏不休」，必欲將其來龍去脈搞個水落石出。所以，儘管這個奏摺一次次地被否定，仍有人一次次執著地把它重新提出來，必欲得到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

在一次國際性的學術會上，筆者曾提出，如果有誰能夠拿出確鑿的證據來，說明《田中奏摺》存在與否，那麼他就將是二戰研究領域裡「歌德巴赫猜想」（編註）的破譯者，就應該獲得歷史研究的最高獎賞。這句話也許有點失之偏頗，但有一點卻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能夠直接證明《田中奏摺》真偽的證據是很難得到了。因為要想證明這個奏摺存在，最簡單

的辦法是把《田中奏摺》的文本原件公布於衆。而要想證明它不存在，也必須把當時日本御書庫的檔案目錄及詳細收文紀錄全部公布。實際上，這兩件事都是難以做到的。且不說戰後五十年有關檔案的大量遺失和銷毀，就是一九四五年美國空軍對東京的幾次大轟炸，日本皇室書庫庫內被戰火焚毀的重要文件也不計其數。一些學者推測，有關《田中奏摺》的第一手資料可能，早已毀於戰火，因此要想拿出直接證據實在是不大可能了。

那麼，《田中奏摺》的存在與否是否就永遠搞不清楚了呢？這樁歷史懸案是否永遠是一個不解之謎了呢？筆者以為尚不致這樣悲觀。五十餘年來，許多專家學者撰寫的論文及各有關當事人發表的回憶錄及答詢講話，為研究《田中奏摺》的真偽提供了大量資料，而各種資料之間的互相矛盾，終究是可以通過分析研討，並通過不斷發掘出來的新資料與新線索，而逐漸消除的。

為了使人們《田中奏摺》的爭論有一個概括的了解，我們不能不對這場爭論的由來與發展做一個簡要的回顧。

《田中奏摺》之說起源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之間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東方會議。這次會議是田中義一出任首相後為研究制定強硬的侵華政策而召開的一次極端機密而又特別重要的會議，出席會議有首相兼外長田中義一，外務省次官森恪，陸軍省次官俊六，海軍省次官大角岑生，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等人，此外還有大藏省，關東廳的首腦人物。會議的議長是一貫主張對華採取強硬手段的外務省實權人物森恪。

這次會議共開了十一天，田中義一在開會致詞中，明確指出這次會議擬「徵求對中國時局之報告與率直坦白之意見」，「同時擬在政府之政策運用上獲得諸位先生之理解」，田中並聲明「涉及細則細目之事項，隨本會議之進展，適應必要，恐將有組織特別委員會之事，此種場合希望予以諒解。」

由於會議的總議題是制定侵華政策，所以田中在開會詞中特別強調「發布新聞有十分留意小心之必要，可發表之事項由植原參與官加以適當安排後發表」，並叮嚀「務請諸位牢記本會之內容以絕對保密」。

東方會議的結果，是田中以訓示方式發布了《對華政策綱領》。這個綱領共有八條，其核心內容是加強對滿蒙的控制與掠奪，公開提出「萬一動亂涉及滿蒙治安紊亂，對我在該地方之特殊地位權益有發生侵害壓迫之虞時，不問其來自任何方面，帝國為加以防護並保持其為國內外人士安居發展之地，必須有不失時機而出之以適當措置之決心。」這就等於公開宣布一旦布滿蒙問題上出現了與其侵略殖民政策相違背的事件，日本可以採取強硬手段予以鎮壓。

東方會議奠定了田中以侵略為前提的基本國策，而加緊對滿蒙的掠奪又必然要影響其他國家的在華利益，這就不能不引起美、英、俄等國家的高度注意。會議以後，田中義一氣焰囂張，不斷強化對中國的侵略，一九二八年四月第二次對山東出兵，五月三日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在這種形勢下，全世界的視線都被引向了日本，引向了中國。日本究竟還要幹些什麼？日本整個侵略擴張的計畫究竟如何？成了各國急切了解的內容。就是在這種形勢

下，傳出了田中義一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向天皇進呈了題為《對滿蒙之積極政策》的秘密奏摺。消息一經傳出，舉世為之矚目。據曾經參與過獵取《田中奏摺》的台灣人士蔡智堪說「各國情報人員到達東京一地者即達二千餘名之多」，但儘管美、俄等國都出高價欲得奏摺全文，結果一無所獲，最後還是中國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公開發表了這個奏摺。

中國方面是怎樣得到這份絕密材料的呢？這裡面有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說法。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甚經過大致如下：當時在日本東京有一位華人富商名叫蔡智堪，他從東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就在日本、南洋一帶經商，由於家資殷實，所以與日本政界的一些首腦人物都有來往。蔡智堪是一位頗具愛國情操的人，早年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投身革命，做過不少有益於國民的事。在日本經商期間，蔡智堪曾多次把從上層人物處得來的消息無代價地提供給張學良將軍。這些情報都是通過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先生轉送的，所以蔡與王也是好朋友。一九二八年六月，王家楨給蔡智堪寄來了一封密信（信藏在一塊特製的糕點裡），請蔡想辦法搞到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出於愛國之情，千方百計籌劃獵取奏章的辦法，但這涉及到日本的最高機密，要想得到是十分困難的。最後，他決定利用日本政黨之間的矛盾來達到目的。當時日本政界有兩大黨派，一個是民政黨，一個是政友會。民政黨受到元老西園寺公望及內大臣牧野伸顯等人的同情和支持；政友會則是以田中為代表的主張以武力吞併滿蒙的擴張主義派。這兩派的鬥爭十分激烈。由於田中出任首相後，推行了一系列加強專制統治的政策，特別是選擇了向外擴張的侵略國策，引起了牧野伸顯等人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田中的擴張主義必將引起少壯軍人的興起，對天皇萬世一系的地位是一個巨大的

威脅，因而急於破壞田中的政策。但如果由民政黨直接出來干涉，必然會激怒政友會的少壯軍人。當時，陸軍整個控制在政友會手中，一旦激化矛盾，對牧野等人不利。如果通過第三者把極機密的田中對滿蒙侵略擴張決策公布出去，通過國際輿論與行動的干涉，則能有力地打擊政友派的氣焰。牧野伸顯急於找機會把田中奏章洩漏出去。蔡智堪看準了這個機會，通過前內務大臣床次竹二郎作介紹，與牧野伸顯見了面，答應幫助牧野伸顯把這份絕密奏摺向全世界公布。於是牧野伸顯動用自己大臣的權力，派他的妻弟山下勇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將化裝成補冊工人的蔡智堪深夜帶入宮中，直達皇室書庫。蔡智堪用碳酸紙蒙在《田中首相奏章》上，費時兩個夜晚，把長達六七十張的奏章抄了出來，並及時送達王家楨手中。王家楨接到文稿後，立即組織了翻譯，並呈報張學良，由張學良親批印製了二百份，分發給北京範圍內有實職的要員，並給南京政府送了四本。這批機密文件在有關人員傳閱過程中，被當時在北京大學讀書的紀清漪（紀曉嵐後裔）見到了，激於愛國之情，紀清漪和當時幾位志同道合的年輕人，集資在北京印了五千冊，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分寄到全國各中小學和有關單位。這樣一來，立即引起軒然大波。《田中奏摺》中的一句名語：「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成為當時全國青年日夕諷讀的字句，也極大地激勵了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南京《時事月報》公開發表了《田中奏摺》的主要內容。

《田中奏摺》公布以後，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注意，其中受震動最大的是日本。當時日本的一些要員，紛紛出面否定奏摺的真實性，田中內閣時的滿鐵副總裁松岡洋右，海相岡田君

介，曾擔任過外相的重光葵都斷然否定《田中奏摺》的存在。他們或斷言從來沒有見過或聽說過這份奏摺；或者斷言這是中國人或外國人偽造的。

二戰結束後，國內外史學界對《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曾進行過多次爭論，出版過一系列的專著，雙方的觀點旗鼓相當。主張《田中奏摺》確實有其事的人，從《田中奏摺》的外傳經過人手，做了大量的調查考證工作。他們從蔡智堪的親口敘述和親筆文章中得到大量線索，又從王家楨先生的回憶和文章中得到印證，然後沿著這些線索和印證進行深入查證，取得了大量符合邏輯的證據。比如《田中奏摺》公布後，一九三一年中國官員在國聯會議上透露了這個文件抄自日本皇家書庫，結果日本將皇家書庫官吏山下勇以下的二十八人全部免官，當時日本報紙曾以大標題報導「蔣介石駐日二十八宿歸天」。如果這個奏摺不存在，日本何必如此欲蓋彌彰？蔡智堪也遭拘捕，家產都被沒收。日本當局顯然因為蔡智堪參加盜取奏摺事件而對他採取此項措施的。後因為蔡利用假名百般遮掩，使日本人找不到他就是「蔡智堪」的真憑實據，才將他放了出來。蔡智堪後來到了台灣，王家楨曾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給蔡寫信云：「閣下宣勤國事，不辭勞瘁，身體既失自由，財產亦遭損失，緬懷高風，曷勝欽遲。」國民黨政府對蔡智堪也給予很高的榮譽，蔡於一九五五年逝世，國民黨要人紛紛題辭來悼念他。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的題辭是「青史留芳」，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勵生的題辭是「忠貞足式」，國民黨行政院長沈鴻烈題輓「永旭忠盡」，就連蔣介石得悉蔡去世的消息後，也親筆題寫了「卓行流馨」四個大字表達了對蔡智堪的紀念。一個普通的老百姓，若不是做出過十分重大的貢獻，這種貢獻若不是完全被印證證實，怎麼會得到如此的殊榮？